

# 从澎湃激情到理性思考

## ——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钟敬文致姚雪垠的两封信谈起

□赵雨佳

2002年1月10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逝世。1月11日，在钟敬文去世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到钟敬文家吊唁时提议，在钟老百日(4月20日)或生日(3月2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钟敬文诗词朗诵会，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积极响应。

4月20日，在钟敬文逝世后一百天的日子里，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会”，以独特的方式追思这位世纪老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会场，悬挂了“钟敬文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横幅，会场右侧陈列了钟老的巨幅遗像，他生前用过的小书桌、木椅子、台灯及伴随他多年的手杖和浅灰色的礼帽；会场左侧展示了钟老生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诗文选集和手稿。台前置放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敬献的花篮。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与会者朗诵了钟敬文的《海滨的二月》《漓江红——郁达夫先生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念奴娇——扫落叶》《碧云寺的秋色》《追悼老舍同志》《忆社戏》等诗词和散文。

中国现代文学馆缘何举办钟敬文诗文遗作吟诵会？我想，这恰恰是对钟敬文“诗人的性情”的理解与诠释，是对“诗人钟敬文”的回应。钟敬文多次说过：“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纵观先生的一生，他始终读诗、爱诗、写诗。他将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以便随时阅读、品味。即使是抗战期间，战地烽火中，他依然携带着《陆放翁全集》，这是他行囊中唯一的书籍。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敬文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诗对于先生来说，是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园地，他以诗言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雄心奔国难，犹余微尚尚诗篇。宏思峻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据统计，钟敬文80余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就有800余首。这些诗篇不仅展现了钟敬文走过的道路，也记录了时代风云变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有两封钟敬文写给姚雪垠先生的信，信中共有四首绝句。

第一封信中的两首绝句：  
其一



钟敬文写给姚雪垠的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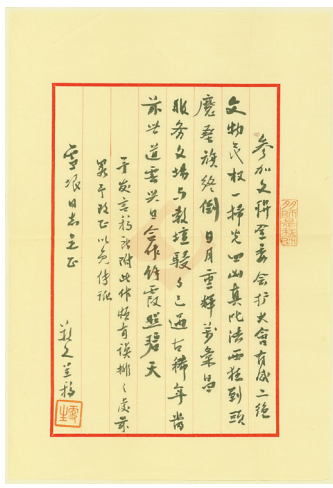
半车麦秸早知名，见面无缘董意倾。  
投老欣逢在西苑，风云气概共长征。  
其二  
兼饶智勇一螻蛄，力破重围更会师。  
妙笔一朝移粉墨，满城争看闹王旗。  
雪垠同志赐题纪念册并承索赠诗，谨作二绝以报还，乞教正。

钟敬文 戊午夏于北京

这封信的信笺非常雅致，用的是薄儒《书画镜屏六扇(后)之四》信笺，信笺整体清静明雅，意趣盎然，山水刚中带韧，人物传神灵动，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诗中所提及的“雪垠同志赐题纪念册”应为《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纪念册》(1978年)，这一次的文联全委扩大会议指的是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拉开了新时期文联组织拨乱反正、恢复生机的历史序幕。文艺工作者们齐聚一堂，就文联和各协会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以及对调整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历了十年“文革”动荡的文艺工作者，再次聚首谋划文艺工作，现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澄清认识的喜悦、自身境遇的感怀、谋划未来的热忱，交汇在一起，让与会代表悲欣交加，心潮澎湃，从《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纪念册》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纪念册扉页为启功毛笔题字“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纪念册”，次为钟敬文自题“清题词作画留念”，次为音乐理论家廖辅叔毛笔题“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纪念册”，共有53位与会代表签名、题字、题诗和绘画，如魏巍、巴金、艾芜、欧阳山、冯至、冰心、沙汀、朱光潜、草明、秦牧等，包括姚雪垠。

那么，姚雪垠在这一纪念册上题了什么话呢？



钟敬文写给姚雪垠的信(二)

是他的旧作《抒怀》。  
抒怀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不持杯酒避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敬文同志指正纪念，七八年六月，姚雪垠

《抒怀》这首诗对姚雪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姚雪垠的长篇巨著《李自成》创作、出版因“文革”而受阻，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交代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请求对创作给予支持，并在信末呈上了一首旧作，即《抒怀》，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表现暮年豪情。毛泽东读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正是如此，《李自成》在特殊的年代才能成功出版。因此这一首诗对于姚雪垠来说意义重大，他在《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纪念册》上题下这首诗绝非偶然，对过去岁月的万千感慨、对未来的无限期许，都化为了这一首自白的心志。而钟敬文回赠的两首绝句，“半车麦秸”指的是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这是姚雪垠的成名作，也是抗战初期文坛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闹王”指的是小说《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甫一出版，便风靡文坛，到1981年第三卷出版后，《李自成》前两卷的总发行量已达到410多万套。诗中既有与姚雪垠相逢的喜悦，也有对姚雪垠智勇的赞叹，更巧妙地融入了姚雪垠的两部重要作品，可谓文思敏捷。

第二封信同样写于1978年，上有两首诗歌：  
参加文联全委扩大会议有感二绝

(其一)  
文物私权一扫光，四凶真比法西斯。  
到头魔旗终倒，日月重辉万汇昌。



钟敬文先生和我们在一起

「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会」现场

(其二)  
服务文场与教坛，骎骎已过古稀年。  
当兹世道云兴日，合作徐霞碧碧天。  
予发言稿所附此作，颇有误排之处，兹略予改正以免传讹。  
雪垠同志是正

敬文呈稿

信中所提的发言稿为钟敬文在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发言《用百倍成绩回击“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野蛮迫害》，他指出：“过去10年间，在被‘四人帮’凶暴地摧残了的文化、学术园地里，民间文学方面无疑是一个重灾区！”在“四人帮”的迫害下，《民间文学》刊物被取消、民间文学工作机构被撤销、民间文学工作者被迫改行、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失散，因此钟敬文由衷地感慨“四凶真比法西斯”，同时感慨现在已是新的日月与天地了，充满了豪情壮志，精神上涌现出一种“余霞尚满天”的感觉。他并没有过度沉溺于痛苦的回忆，长久地控诉“四人帮”，也没有喜不自胜，沉浸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喜悦中忘乎所以，而是开始思考民间文学的道路与未来。短短几个月，他就已经从澎湃的激情转向了理性的思考。

1978年，钟敬文已经75岁了，正如他所说“骎骎已过古稀年”，但是他依然为民间文学的未来而奔走，践行着自己的道路：“只要有利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而我的体力还能支持，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1978年，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成立了筹备小组，钟敬文作为筹备小组成员参加了筹备工作。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文艺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

# 为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找到立足之地

## ——钟敬文的国际视野与学术实践

□陈昕

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谈论民俗学的定义与任务，讲话内容旁征博引、全面翔实，就“民俗学”的定义而言，便列举出英国弗雷泽、日本柳田国男、西村真次、法国山狄夫、德国黎尔等学者的不同看法，在谈及民俗学的方法时，也谈到芬兰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德国赫尔德发起的诗歌搜集运动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求知若渴而博采众长，钟敬文在各家理论思潮中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并逐渐建构了中国独特的民间文艺学学科理想：重视中国文学的考据传统，不仅学习法国社会学派在形式上以自然科学为模板，客观地收集、比较、分析对象，研究普遍的规律，也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外，提出历史民俗学研究，旨在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

### 热切活跃的中外交流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空前紧张，为抗日的目的，这期间中国的“日语学习热”和“日本研究热”也日渐兴盛。1932年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主动与日本学界进行双向的学术交流，钟敬文便是主力军之一。在与日本民俗学者书信往来的同时，钟敬文明确了自己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志向，也为自己赴日留学铺平了道路，1933年《日本期刊》《日本民俗学》第11期发表了钟敬文的《中国民谭的形式》(中译《中国民谭型式》)，在小序中，他回顾了近年来受邻国此学之先进者如南方熊熊、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诸先生影响的民间故事研究经历，而这一文章也极大地触动了日本学界，尤其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在其编写的《民俗学》一书译入中国后，他在序文里写道：“钟教授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中国民谭型式》，使我不禁对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次打开了眼界……钟教授的论文，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口承文学的契机之一。”也是基于此，关先生称钟敬文为“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前辈”。

除了与日本学者热火朝天的书信往来，德国学者艾伯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展开了通讯交流并互相寄赠书刊，在其1937年

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动物与人”大类中就参考了钟先生在《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所写作的“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这一类型，艾伯华在为德国编纂《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撰写“钟敬文”条目时，也郑重介绍过他的《中国民谭型式》一文。钟敬文与众多国外学者既严谨务实地讨论学术，又充满了关切和热爱。20世纪50年代中期，钟敬文主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务时，曾接到过苏联李福清博士捎来的论文抽印本，当时两人只有信件往来，无缘会面，直到很久以后两人才见面。钟敬文在《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序言中回忆：“(初次见面)他一面紧握着我的手，一面用熟练的中国话说(带着感情地)：我来中国三次，这一次才算见到您”，“那天下午，我们在对外友协的客厅里连续畅谈了两个小时，分手时已经近黄昏了。临时时在庭园中拍的那张照片，虽然部分景象有些模糊，却仍然使我宝贝它。”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曾与钟敬文学术对话多次，1978年《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译本出版后，钟敬文“满心欢喜”地应邀为丁乃通作序，提起丁教授曾寄赠过译本的英文原著，丁乃通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也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搜集和研究，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当时许多前辈，如钟敬文、赵景深等诸位先生，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事有许多相似处，初步作了一些分类”，借此略表饮水思源之意。不仅是信件往来中的学术对话，钟敬文晚年仍热切愿意参与相关国际学术交流互动。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芬兰民间文艺界在广西三江地区联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民间文艺实地考察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举办民间文艺考察活动。钟敬文时年已高，虽未参与实地考察，但在联合调查前召开的中芬民间文艺搜集保管学术会中，他委派了刘锡诚宣读他对本次活动的贺信。1994年，中日韩三国部分研究民间故事的教授提议成立亚细亚民间叙事学会，该学会以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任务，每年对民间文学的各种文类进行探讨和交流，还特别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以起到世界民间叙事研究的桥梁作用。当时

的钟敬文已入耄耋之年，依旧密切关注学会动向，大力支持学会工作，并欣然答应担任顾问。他说：“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的亲缘关系的确是很客观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这既说明这个跨国界的学术组织今后任务的沉重，同时也说明它的创立和活动是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次年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上，钟敬文发表了《对民间故事探究的一些认识和意见》的讲话。2000年，在钟敬文、启功、李宁等学者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钟敬文便邀请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前来中国召开“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其对国际间学术对话交流的热情如斯。

### 为民族、为世界的学科建设

钟敬文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者，更是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特殊的学科加以理论设计和学术实践，把它的各种意义与价值融合在统一的范畴里，对其定位不仅仅是一国之学科，更是为民族、为世界的学科，“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钟敬文的国际化雄心体现在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对于国外理论动向，钟敬文自年轻时，便有敏锐前瞻的学术眼光，既虚心引荐，又辩证思考，为民间文艺学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石。钟先生是类型研究方法最早的引入者，并身体力行地对其实践。在杭州时，钟敬文写的《中国的太阳神话研究》《中日共同的神话物语》《朝鲜民谭的比较》等论文草稿，以及1935年发表的《老赖推传说之发生地》，都致力于从同类故事中寻找发源地及其传播途径，是在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类型比较上的研究成果。为了让国内的学者更多地了解到类型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刘魁立等学者的共同带动下，钟敬文对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翻译和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后者的序言中提到：“有些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民间故事

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但是民间文学研究会恢复工作暂缓，直到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活动。这期间，钟敬文一直在思考民间文学学科体系、民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1978年暑假，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民间文学”重新进入中文系课程。8月，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作了题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讲话，提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民间文学作品等)是后者(民俗志)这个学术‘国家’里的一部分‘公民’，在这学术‘国家’里占据着一定的疆土”，并组织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9月9日，钟敬文写了一篇《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的长文(1979年2月末改订，发表于《民间文学》1979年7月号)，长文不仅批判了“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谬见，更指出了民间文学的意义，“民间传说所取材的历史人物，不一定需要符合他的传记事实，因为它着重的往往是对社会事件的真实(内在意义上的真实)”。钟敬文在《民间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认为五四以来的歌谣学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倾向。1979年5月，钟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的发言，认为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影响。11月4日至10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筹备小组成员的钟敬文致开幕词，并当选为副主席，在会上作了发言《把我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水平》，“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专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历史的和现在的口头创作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以便最后得出关于它的种种规律”，“我们必须趁当前学术界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时机，认真检查过去的学风，经过辨明是非，从而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我想，我们是一定会建立起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来的”，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对我国民间文艺学进行了再思考和再梳理。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钟敬文聚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为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学者”。

在“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会”最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全体师生上台齐声唱起由钟敬文1930年作词、程懋筠作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歌唱道：“这儿是一所壮美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寞！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苦！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会惊人地热闹！”我想，以钟敬文为师，学习他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和精神风范，今天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花园一定更加繁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是自成体系的东西，它跟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很少相同。这种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反驳之前，是颇容易被人相信的。”钟敬文一再强调学习他国理论的重要性，提醒国内民俗学研究者不要故步自封，进行井底之蛙的研究。

关于国外民俗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译介，钟先生也颇费苦心。在日学习手不释卷时，他依旧不忘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并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50年代，钟敬文所在的民研会为了帮助青年学习民间文学理论，曾编辑过《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70年代末他意识到苏联学界近年来有新的发展，而我国的社会情况和学界情形跟过去也大有不同，于是“痛感到有再编一部苏联民间文学新论集的必要”(《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序)。为了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资料，钟敬文多次向李福清请教。2004年《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的出版了却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愿，该丛书出了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钟敬文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后，于1953年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不仅为国内新一代民俗学者提供了学习机会，还格外关怀前往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现任印度尼西亚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的莫普德教授在钟敬文120周年诞辰上怀念钟老时提到：“1987年，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往事历历在心头，我在北师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受到钟敬文教授的亲切接见，他为人谦虚、心胸开阔。”钟敬文不仅在学术上给予留学生以教诲，赠予诸多书籍，还细心关照其生活，为异国他乡的学生庆祝生日。除此之外，韩国学者郑然鹤、日本学者广田律子都受到过钟老无微不至的关照，钟敬文对待学术的严谨、对待学生的宽和，使如今闻名遐迩的民俗学者们仍念念不忘。

在上世纪末谈及当代民俗学的定位时，钟敬文曾言：“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别的国家民俗学的附庸或‘派出所’。诚如斯言，钟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决心足以用一生写就，其跨文化的学术根基和国际视野造就了他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战略性思考，如此他的坚定与雄心，使得一代代海内外民俗学界同仁深受其影响，也逐渐为中国民俗学在世界民俗学中找到立足之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